

周作人不識重輕

●王覺源

周氏兄弟祇說豈明

輕重識不人作周

會以左派作家著名的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年），有兄弟三人。以周氏兄弟皆學有根基度之，當係書香世家。但其家業，至其祖父時代，已因賄賂案所累而中落。父鳳儀（伯宜）早卒。母魯氏名瑞。「魯迅」之命名，據其自道，即源於母姓（魯、周古為同姓之國）。籍隸浙江紹興。魯迅兄弟三個，魯迅居長，原名周樹人。「魯迅」乃其發表作品時的筆名。不過他的筆名很多，不下百數十個。以「魯迅」二字，用得最多，亦以「魯迅」之名著稱於民初以後的文壇。「周樹人」三字，反而知者極少。他曾留學日本，回國後，歷任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師大、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校教授。主辦過「語絲」、「萌芽」等雜誌。一生譯作很多，被目為左派文壇的領袖。魯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紹興任小學及中級學校教員。九年入學北大，繼留學日本，回國後，曾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擔任自然科學的編輯，兼任雜誌編輯工作。與瞿秋白交好，得任大學教授。從此常與中共人物聯絡。中共佔

據大陸後，投靠紅朝，現已成了文化界的重要人。

本文的主角周老二作人，字啓明，又署豈明，號知堂，晚號苦茶庵老人。時人之尊崇者，常以「豈明夫子」稱之；因其行二，又以「周二老」稱之。這是因為他生性相當固執，人有與他打交道商事者，常多搖頭太息曰：「難、難、難？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意即指其事多堅持己見，說一不二，不受商量；但又不能不尊重他。雖胡適之、馬玉藻有時也得讓三分。「二老」之名，即由此傳播開來。他和魯迅一樣，所用筆名很多。文名亦與魯迅相伯仲，不過思想與出處，則稍殊其途耳。

故周氏三兄弟，老三周建人的文字和知名度，初固遠遜於周老大、老二；但在不講究質的紅朝，他頗佔有相當斤兩。就魯迅與周作人的文名比較來說，激進者向以魯迅為尊；溫和者則以豈明為魁；軒輊難分，全由於說者之觀點不同而異。實則魯迅左傾，失之中道；豈明附逆，為德不卒；半斤八兩，又皆為智者所不取。本文所要說的，祇限於豈明周作人，而不及樹人、建人。而周作人本一孔門中庸有道的學者，其文雖可佩，

晚節却可議，一生美譽，則全自毀於「不識重與輕」（胡適之原希望他「識得重與輕」，見後）之一念中。

教書寫作終其一生

周作人生於清光緒九年（一八八四）十二月，小於魯迅三歲。六歲入學。十二歲喪父。二十二歲（一九〇六）時，正日本戰勝俄國之後，考取了公費留日。時魯迅已先四年赴日，適回國省親，母命與之偕往。初習法政，嗣因眼近視之故，改習土木工程；但其興趣所近。二十五歲，與一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結婚。辛亥革命時，偕妻回國。他留日共約五年。回國後，從事教育工作、任教北京大學，亦非用其所學。

民國八、九年時代，中國新文化運動初起，常於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發表作品。十年一月，與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等，組織「文學研究會」。這是民國以來，最大的一個新文學團體。以提倡自然主義；標榜人生的藝術為主旨。與「創造社」（民國十一年在東京正式成立）諸成員，時開筆戰，攻擊郭沫若、張資平、郁達夫、成

仿吾等爲頹廢派、肉慾主義者。十四年，也與「現代評論」，大打筆墨官司。在「語絲」上發表論文，激烈的向舊勢力舊思想，進行打鬥，角逐文壇。這與講孔子中庸之道的文學作家，實大異其旨。從此他的作品，四方放射，除新青年、新潮之外，凡太平洋雜誌、人間世雜誌、宇宙風、獨立評論、生活周刊、論語半月刊、西風、大風、逸經，乃至報紙副刊。或爲發行、或爲主編或爲投稿作者，諸多報刊，無不佔有一席。直到對日抗戰時，他在文壇，便已隱爲北方的盟主，南進的英雄。

周作人在教書方面，自民初至抗戰勝利，一直以任北大教授爲軸心，團團轉的兼任了師大、北大女子文理學院、燕京大學等校教授，前後幾歷二十年。僅張作霖在京任大元帥時代，離開過一短時期。周作人名氣之大，文教界幾無人不知。上課來不及時，則輪流請假。北洋時代的政府，既無教授兼課的限制，欠薪又經常積壓至一二年之久。故教授請假缺課，多視爲家常便飯。祇是他執鞭說教，要比寫文章略遜一籌，有一肚皮的思想學問，口才不及其筆才與天才，所以他未能成爲一個文教界的全才。

對日抗戰發生，二十六年秋，北大南遷。周作人未動，仍由北大任爲留校教授。二十七年並兼任了燕大的客座教授。二十八年元月，在其住宅遇狙受傷。究爲愛國志士之懲奸，抑係敵方特務的威脅？真相，他當能自知。及是年秋已敷衍不下了，終於變節，落水作了漢奸。時年已五十六歲，接任僞北大文學院院長。次年，繼湯爾和

任華北偽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相當於北洋時代教育總長）。直到三十四年，抗戰勝利，被捕下獄。至三十七年，才脫離牢獄之災，返北平，繼續其寫作譯述工作。

一身負擔三家生活

周作人兄弟，從原籍浙江紹興遷到北京，初寄居紹興會館。大約是在民國八年前後，才賣了紹興故宅，買下北京八道灣十一號住宅。三兄弟與母魯太夫人同住。初兄弟相當友愛合作，共炊共爨。十二年左右，魯迅與周作人反目。魯迅借其原配朱安，初遷居磚塔胡同，再遷阜城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自購住宅。母親魯太夫人、周作人夫婦偕子女、周建人（時在上海工作）的元配（係豈明夫人羽太信子的親妹妹）和其子女，仍同住於八道灣共同生活。魯迅與周作人，在京同住近十年，相當友善，爲何忽然失和？有謂：妯娌小孩共室，失和常所不免的。有謂爲：魯迅對周作人愛聽婦人之言，積久由疑生怨，時生口角。局外人自難明其真相。周家兄弟，亦始終緘口未言。稍後，魯迅以工作關係，由粵赴滬。十六年又與許廣平同居，別營香巢。許廣平一名景宋，祖籍福建，在廣東生長。才情卓越，國文基礎好。在北平女師大讀書，因鬧學潮，被學校開除。時北洋政府，章士釗任教育總長，下令解散女師大。以後魯迅等復校，令許廣平亦復學。此爲許、魯結緣之始。十五年，許畢業後，赴廣州任女師訓導主任。魯迅任廣州中山大學教務主任

兼文學系主任時，許任助教。相處日久，情感益深。會國民黨清黨，與當局意見不合，乃相率離粵至上海。十六年，遂告同居。這對師生戀愛，據說能相當合作。大陸陷共後，許亦成了紅朝顯要人物。毛澤東特許之入黨。及五十七年，因被江青等四人幫迫害，憂憤去世。時年已七十一歲。有一子名海嬰。魯迅在民國二十五年，已去世於上海，一切後事，也是由許廣平辦了的。動亂中，她以保全魯迅遺作自負，守死勿去。魯迅與許廣平同居，非妻非妾。且不管其名義爲何；但魯迅在北京的家眷髮妻朱安和母親，便不交而交的給豈明照顧了。周建人因赴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與小老婆同居。其留在北京的家眷，亦不託而託了豈明，他也實無旁貸的養活起來。周作人原是一個極重倫理觀念、孝友之情最篤的人。這或許正是他後來忠孝交戰之後，而落水爲奸的主要原因。抗戰先一年，魯迅死滬。而周作人住在北京，實際上則負了老母和三房家室的生活責任。正如他「五十自壽詩」中所描述情景：這個老僧（是其自稱，實不老）在北平，不但在吃「苦茶」，還在吃「苦飯」咧！

周作人以「好些老小」人口鼎盛的關係，於民國八年後，以本宅太小，乃遷家於北京西城八道灣百花深處（魯迅與周建人已居上海）。有一個詩與童話都寫得極優美的、盲目的流浪詩人愛羅先珂（時在北大講學），這時亦長客居於其家。百花深處十一號的住宅，不但地名富有詩意的雅緻，且是一棟北京傳統式的巨廈，非常寬敞堂皇。前後庭院深深，花樹滿園。客廳、書齋、

長廊，皆極古雅。所有房舍夾在前後院花樹之間，也透着一股陳年木料的芬芳。客廳、書齋四壁，都是玻璃門的書櫥，所收藏中西書籍之豐，簡直成了一座書庫。較之北京一般世家富室毫無遜色。身入其境者，更有置身深山古寺之感！景物清幽，深院寂寂，自然也是一最好的寫作環境。豈明未離平南下，戀戀這宅第環境，當係原因之一。豈明好客愛交朋友，座上客常滿，也不乏日本人士。門雖設而常開，來去自由，了無拘束。來則「寒齋吃苦茶」，能清談竟日；去則主人必親送出門，始終不改古道作風。

生活規矩文人典型

周作人「五十生日詩」中，有「請到寒齋吃苦茶」之句，「苦茶庵」，便是他居室的齋名。不僅傳遍中國文壇，也遠播到日、英、美諸邦的文化界。其實所謂「吃苦茶」，並無什麼特別排場考究。茶具與臺灣和日本家用茶具一樣，一壺數杯。茶葉亦不講究，不過普通的龍井香片而已。客人來時，僕人便將開水沖好，送置茶几之上。主人禮貌的斟上第一杯，以後則主客隨便，自斟自飲。可以細品，亦可牛飲。茶壺空了，僕人另加開水，而不添茶葉。他既不愛用上蓋下托三瓣式的茶碗（北平很時興的蓋碗兒茶）；也不喜用潮州和日式的小壺小杯；或嫌其麻煩而又喝得不痛快的緣故。如在冬天，客廳中則燃燒着一座洋鐵爐，藉以取暖。其實北京大家巨室之內，並不太冷，升上火爐，好似主客坐談，有一個中心一樣。如在夏天，茶几則代替了火爐。几上置一竹製

簸箕，箕內放置很多各式各樣的扇子。主客各取用一把，信手揮動，悠悠自得！信口開合幾乎無所不談。這情景，都是在臺灣不易見到想到的。

周作人身材中等，面貌為圓長型，儀容端正，舉止則循規蹈矩，沒有一點輕浮放蕩之態。或為生性使然或為家教所致，乃一典型的文人。通常文人，多有不修邊幅的毛病，而豈明夫子，對於生活習性，多能自理自治。衣着隨便，而不忽視整潔。夏季在家，經常是紡綢衫褲、平底布鞋。出門則加一襲綢長褂，顯得非常輕鬆瀟灑。冬季則着綢面絲棉長袍。因浙江多產絲綢，亦多用以製衣服，他不改家鄉生活的老習慣。他自小即有近視，經常戴一副無邊金腳的眼鏡。一生寫作生涯，特重窗明几淨的環境，却從不考究所用的文房四寶。墨、硯既極普通；紙則為有紅格的毛邊紙。筆除毛筆之外，曾沒有拿過鉛筆、鋼筆，自然更沒有用過自來水筆和原子筆（出獄回平以後，則不得而知）。現代有些作家，動輒說平均每天寫幾千上萬的字，這自然算是特殊天才。若豈明夫子，雖沒有表明過；但他每日不論寫多少，都是一手親筆，從來沒有用過書記，也沒有假手任何人，幫他來抄寫。一天能寫幾千上萬字的作家，不知是否如此？我則自愧不能。

思想中庸生性固執

周作人既是一個習於中庸思想的文學家，自然不是一個保守的頑固份子；也決不是一個積極的思想家。所以與其長兄魯迅有別，亦與其三弟建人為殊。但因其生性固執，間常有些不近人情

之處，反而是一個極有毅力、性格堅定的人。因之，對於日常事情的應付，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不能偷閒時，絕不偷閒；不能退讓時，絕不退讓。譬如一件極小的事：他在北大任教時，課程時間或人事上的安排，他說定了，就不能變更。雖院長如胡適之、系主任如馬玉藻，也有無可奈何之嘆！這種情形，上面我已經提到過。在「文學研究會」與「語絲」時代，動輒大開筆戰；在任教授的時候，總愛干預系、院、校政；亦無一不是出於他的固執之見。結果，大家都祇好「二老」、「大老」的敷衍了事。

不過他的心眼，總不算壞，一人負擔老母和三家人的生活，毫無怨言。而其待人接物，更是非常和藹誠敬。即一日數見之客，態度一貫親切。客有問，主無不答，答無不盡。對於學生晚辈，解說尤不厭其詳，必使之心意完全滿足而止。魯迅原被左派文壇譽為「我們的太陽」（後來郭沫若讚史達林，亦有此說）。他死後，初葬於上海萬國公墓，民國四十五年，為其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改葬於上海虹口公園。紅朝毛主席（澤東）還親題了「魯迅先生之墓」的石碑。戰前某文學巨頭，對周作人的評價，則高於魯迅。認為豈明夫子，為浙東的近代大思想家。在五四時代，論積極和革命，實不算是過譽之詞。因為魯迅詩壇「打油」；文則長於「罵人」；別無特色。曾有某君（忘其名），由港飛臺，往晤張漢卿先生，閒談甚久。某問張：近來看什麼書？張答：明史外，還看「魯迅全集」。某問為何看此書？張答：「魯迅罵人，罵得尖刻、深入骨髓」。（四十四

年十月，香港某報消息）張氏算已領略到魯迅罵人的技術了。說魯迅「打油又罵人」，更舉一例以證之：大約在民國二十一年左右，郁達夫有一次請客吃飯。魯迅在座，即席寫了一首題名「自嘲」七律，送柳亞子云：「運交華蓋復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舊帽遮顏過鬧市，破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此詩原稿後，還有幾句說明：「達夫賞飯，閒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自認「打油」，算他尚有自知之明。「偷得半聯」，正是他從清代詩人洪亮吉詩中偷來的。詩中寓意，當然別有所指。這些且都不說他。但其罵人刻薄入骨，則已躍然紙上。魯迅罵人出了名，此詩五六兩句，當時並成爲傳誦一時的名句。魯迅且常書作對聯以送人。我在老舍處，就見過此聯。再說，在五卅時代，論積極性和革命性，周作人也超過魯迅。周作人當時積極喧嘩理初、李卓吾，遠如王充的思想；反對吃人的禮教，反對道學，都比魯迅高明而努力；但對他的中庸思想，並未超出。鄰邦日本文壇，對於周作人的評說，有謂：他對中國儒家的中道；日本的古典文學；中國魏晉六朝的平民文學；希臘的神話和戲劇；歐洲尤其英國的文學；都有高深的修養。可是毫無宗教思想。日本學者，亦有擬豈明爲「六朝不食烟火的大思想家」。也有人將他與圍棋大家吳清源並稱爲「支那二寶」。

日本至今仍無法產生如周作人這樣的角色。在日本人如此積極推崇、引誘、包圍之下，周作人究非真能體認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節義

之士，又焉得而不頭腦昏沉，重輕莫辨，誤入歧途！

散文作品膾炙人口

中國「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最初的發軔，實以北京大學爲大本營。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是一個主張百家爭鳴（目的異於中共的鳴放）的思想家和實踐家，是文藝界最尊崇的領袖。其他如胡適之、陳獨秀、錢玄同等，皆屬這運動的領導人物。這運動的主旨，在「倡導科學與民主」，亦爲新文學革命時期。新的戲劇，剛剛萌芽，趕不上小說和詩歌。散文也和戲劇一樣，祇有一些雜文。比較優秀的，也祇有魯迅、周作人等幾個人，在「新青年」上，所發表的很多雜文。這即是說，在民國十年以前，所謂文學革命的主題，是偏重於鼓吹白話文學，和一般性質的散文與白話詩。這時白話文，已成爲國語。白話詩，也有不少佳作出現，如胡適之、陳獨秀、劉半農、周作人等，都是風頭很健的。

周作人初期所作的白話詩「小河」，雖不太協韻，却很有自然的音調和優美的意境。如：「：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經隱隱的流過我的面前，我對他點頭，他對我微笑，我願他能够放出了石堰，仍然隱隱的流着，向我微笑。」白話詩，直到民國十一、二年，才比較進步。這從周作人的「詩集」中，亦略可窺見一斑。周作人的作品，過去集而出版者，除詩集、論文集、書信集、譯集、小說集之外，尚有散文集。他的散文作品，是最膾炙人口的。

大體說來，他早年的文章，不僅已具清淡的味道，而且清淡中蘊有濃厚的感情。民國十一年，他還不過三十歲；但他所作「懷愛羅先珂」（從小雙目失明的「盲詩人」）一文，曾與陳衡哲的「小雨點」，許地山的「落花生」，齊稱於時。都是散文中的精華，抒情文中的上品。而周作人的散文，又是從「五四」以來，大家所公認寫得最成功的。風格純樸，沒有第二人能及。胡適之對他的學生會說過：「周先生的散文，你們是學不會的，也不一定學他的。你們白話文的老師，是施耐庵、曹雪芹、吳敬梓、劉鐵雲他們。」真的，豈明夫子的學生中之富有學問者，有的學豈明的散文，很像；可惜學識，都不及其師的博達。

希夷之詩今古皆有

就白話詩而言，周作人五十生日時，曾作「五十自壽」七律一首，發表於「人間世」雜誌，詩云：「常說出家今在家，且將袍子當袈裟。街頭竟日聽談鬼，窗下終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古董，拖鞋赤足掃芝麻；人家若問其中意，請到寒齋吃苦茶。」是描述當時的客觀環境，且能含蓄不露。當算是白話詩中的上品。當時發表於某雜誌，和者頗多，如錢玄同、劉半農、林語堂等，皆有佳章。現在且不必記述。

及民國二十八年秋，周作人落水當漢奸以後，有陳子展者，仍步周作人「五十自壽詩」原韻，發表一詩於民意週刊曰：「老夫詩本不名家，劇韻姑成一字差。救世莫爲千佛手，做人須學兩

中 頭蛇；男兒自翹鬚眉髮，官相雖全黑胖麻；生活
外 近來新幾許，咖啡不喝喝紅茶。」說他「終年學
雜 畫蛇」，畫來畫去，只畫出一條兩頭蛇。隔了不
誌 久，該刊復載傅尙果一七絕云：「既然前世着袈
裝，可惜今生未出家，說虎詠龍還罷了，如何竟
畫兩頭蛇」？

由上述兩詩，我也連想到：史傳五代南唐、

魏明好吟詩，動輒數百言。黨袖以諷韓熙載（南
唐中書侍郎、善屬文）。熙載伴辭以目暗，且置
几上。明曰：然則某自誦之可乎？熙載頻搖其首
曰：適耳忽聾。此即明指其詩，不堪入目，也不
堪入耳。魏明祇得懷慙而去。賈似道初入相，有
人作詩贈之曰：「收拾乾坤一担擔，上肩容易下
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祇
是通俗而已，尚不卑下。相傳安祿山賜其子櫻桃
一筐，並附以詩曰：「櫻桃一籃子，半青與半黃
，一半與懷王（祿山反時封贈），一半與周贊」。
懷王為祿山子，周贊則為其子之友。有見其詩者
，告祿山曰，若改「一半與周贊，一半與懷王」
，則較為諧韻。祿山答曰：「豈可使周贊先於吾
子！」

前人有集經、子中語，作詠屁詩曰：「視之
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自口出
，人皆掩鼻而過之。」可見希夷之詩，今古皆有
，宜乎令人目暗耳聾。周作人原詩，大約是作於
民國二十二年，如取下有色眼鏡來看，自稱是寫
實抒情之作；但經過輕之者幾番推敲折騰之後，
面目全非，不希夷也希夷了。俗說：「時乖命舛
金成鐵」，這也就難怪了！

胡適與老僧談重輕

對日抗戰，北方淪陷，北大南遷。時北大校
長蔣夢麟曾由南方去電北平，防北大教授，都到
長沙「臨時大學」集合。這是由北大、清華、天
津南開三校，臨時組合的大學。南京淪落，再遷
到昆明後，改為「西南聯合大學」——稱西南聯
大。在昆明西城牆外，蓋了一些泥牆、草頂、紙
窗、泥地的教室和宿舍。如老病、家累，不能離
開者，暫留北平，校方承認其為「留平教授」。
北大所留四人：一為周作人，他的日文、日語都
很好，且是日本人最尊崇的中國文學家、學者。
一為孟森，未久病故於北平。一為馬玉藻，為
人懦弱怕事。一為馮祖荀，略有神經質。周作
人七七事變時，沒有離平。因他在事變前，已被
日本特務牢牢釘住。經常有日本人跑到他家，談
天說地，進行煽惑。時胡適之正在倫敦，奉命將
出任駐美大使。深恐豈明被日人挾持去當漢奸。
曾寄新詩一首，內有「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之
句，在勸老僧離平赴昆明。胡適此時，已明老僧
的處境，或尚不知豈明已被校方用護校名義，任
為「留平教授」之事。其與周作人「談重輕」的
白話詩有云：

藏暉居士昨夜作一個夢，
夢見苦雨庵中吃苦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
飄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
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詩末註明的時間、地點，是「一九三八、八
、四、倫敦。」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老僧便
以「苦住菴吟」回敬了胡適。詩云：

老僧假裝吃苦茶，
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
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
結果祇好改號苦住。

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
忽然接到一封遠來信，
海天萬里八行書，
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

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並不是出了家特別忙，
因為蒼裏住的好些老小。

我還祇能關門敲木魚唸經，
出門托鉢募化些米麵，
老僧始終是個老僧，
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雖改「苦茶菴」為「苦住菴」，尚裝着老僧
苦守清規的態度；但其意態，似已有些游移，終
不敢道出「捨輕就重」的話。不過老僧此詩，還
是經過一年多以後，才落到胡適的手中。這遲到
的原因，據說：為胡適與老僧約定暗名「胡安定
」，大使館的人，不知為誰，信便被壓在信箱裏

。後來被胡適親自發現，始得讀之。胡氏隨於二十八年冬（十二月十三），回寄老僧七言絕句一首，故有「兩張照片詩三首，今日開誠一惘然！無人識得胡安定，扔在空箱過一年」之言。其實老僧，則早在是年秋季，已落水為奸了。胡適尚與漢奸通訊。雖不知不罪；但他原來期望老僧「識得重與輕」之意，則已空勞悵望，付之東流了。

文奸末路行屍走肉

原來創造社四大將之一的張資平（另三將為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在上海被日本收買。初還不為文化界人士相信。認為他雖具有頹廢派的思想，也不會喪心病狂若是。及其認為中庸守道之士的周作人附逆，文壇人士，初亦以為不確，指是敵人造謠。但一傳、再傳、三傳，謠言被證實為事實之後，始則駭然惋惜！繼則大肆攻擊，謂比官僚政客作漢奸者，更為無恥！真是非至歲暮天寒，不能見松柏堅貞節亮之操也。

七七抗戰前，局勢異常緊張。國人和戰主張，自不一其論。文人主張和者則謂：「不可輕易與強過我者作戰，否則可一舉而亡國滅族。」這派可以負文教領導而兼外交家的蔣某為之代表。在廬山談話會中，即有此主張。勝利後，審問漢奸時，又都改了口。主戰者則說：「既然逼到這一步，也只好打了。」這派即是文化教育界負領導責任的胡某等。中國的士大夫，常說重氣節、講道義；但遇到動亂之世，總怕捲入是非漩渦。還不說是時窮節見，乃古今一轍。中國人常說

的一句話：「文人無行」。所謂「行」，通常指的是放蕩不羈、風流成性的「行」。實則要包括「氣節道義」之「行」在內。平常能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人多，能實際做到的人，則千古幾人？有之，你能說不是迫不得已，絕路造成的嗎？如洪承疇輩，固不算文人。而敵人不來則已，敵若臨門，首先叩頭稱臣，如錢牧齋之流者，則為道道地地的文人。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王揖唐、王克敏輩，何一不是文人？實都辱沒了文文山正氣；謝舉羽的西臺！

等而下之，像周作人之徒，對「能愛人、能惡人」的名器，取之不敢，拒之不能，又算得什麼？本古聖先賢之道，固可苛求；但存點忠厚，講點人情物理，過火苛責，亦大可不必要。何況周作人在復胡適詩中，亦已自道其苦衷：「因為菴裏住的好些老小，……屋漏地上又浸水，……出門托鉢募化些米麵」，「怕一家老小餓死事大」，即已隱約見其意旨了。清末民初，江東才子楊雲史詩有云：「喪亂各無恙，鬚眉應改觀，無心說山水，有骨敵飢寒。」無心、有骨一聯，固可給有閒的士大夫和沒有氣節的文奸當頭棒喝；但他究未親臨到「時窮節見」的地步。

對日抗戰勝利後，三十四年十二月，周作人以漢奸罪被捕。經法院判罪十三年（或云十四年），服刑於南京老虎橋監獄，與周佛海、江亢虎等同牢。龔德柏（老報人、國大代表，來臺去世），有一次去探監看周佛海。那天正值周作人庭訊之期，有很多文化界人士，都待在門外，想一睹老僧的顏色。龔與周作人，亦屬舊交，則作

了禮貌上的迴避，未與碰面。三十七年秋，因政局轉變，舊曆除夕前，周作人原非罪大惡極，幸得提前開釋。在滬待車北上。戰後，胡適任北大校長，當北平緊急之時，被政府派專機接來上海。周作人聞之，深慚「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之言，乃託人向胡適致意：「謝其十年前贈詩的「深厚的情意」！一猶「勸胡適留在國內」。胡適原是勸周「識得重與輕」的人，現在又那能自甘墮落！周作人脫離囚籠，到了北平以後，仍理舊業以終其生。譯述著作之多，亦不減於魯迅。死於民國五十五年（有謂為五十八年）八月，享年八十三歲。雖比魯迅在人世多活了二十多年，亦未如其他文奸，遭到清算鬥爭或下放改造的虐待，其為行屍走肉則一耳。

本雜誌本期裝訂如有掉頁、缺頁、破損，請寄回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調換。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 著定價 200元

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貳佰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玖元）